

追问录

上海三联书店



◎ 王晓明 著

本书探讨的中国文人并不是一种已经过去过的现象。不但他们的许多创造物至今还活在我们中间，影响甚至制约着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自己，也还健壮地活在世上，许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其实都还是文人，是孔子和老庄们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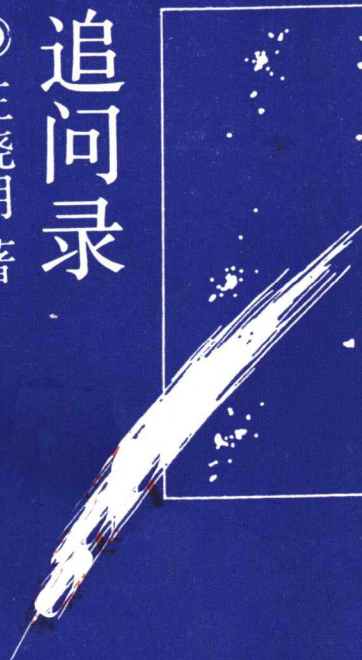
如果真要实践那句刻在雅典神庙上的千古名言：「认识你自己」，弄清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魂，一个基本的询问方向，似乎就应该指向我们的祖先，指向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那几代文人。

B842
W384

B842
501

追问录

◎ 王晓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106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鲁继德

追 问 录

王晓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750

印数: 1—1600

ISBN 7-5426-0525-9/G·84

定价 3.50 元

目 录

一	小 引	1
二	在邪恶人心的包围中	3
三	过于世故的眼光	9
四	倘若甘罗绵绵不绝	13
五	可怜的韩非	18
六	孔夫子的火眼金睛	23
七	两全其美的 “性善论”	27
八	但愿鲁迅说错了	32
九	君位崇拜的俘虏	38
十	被挤扁了的灵魂	43
十一	“孝道”——一个 诱人的比喻	51
十二	可怕的“穷”字	56
十三	骨子里的悲观	62

十四	阿Q真是吹牛吗……	68
十五	工兵式的紧张……	74
十六	《道德经》里的 三个声音……	82
十七	不识抬举……	88
十八	处世之道的 代名词……	96
十九	管家式的弹性 原则……	100
二十	聪明人的道路……	107
二十一	佯狂、装傻、 称病和标榜腐败…	114
二十二	在文字记载的 世界之外……	121
二十三	孙悟空和六耳 猕猴……	127
二十四	逼出来的无耻……	133
二十五	历史的阴影……	143
	后 记……	148

一 小 引

我常想，要做个凡事都能追问到底的人，实在是非常难。有些事情太让人泄气，倘若一味地深掘下去，你会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要后悔活成这样无趣的人世间；有些事情又太复杂，远由近因纠缠成一团，你好容易才打开这一个结，那边又牵出一股更乱的线，你常常累得抬不起手臂，不知不觉就丧失了追究到底的勇气。譬如我从事文学研究，就有一大堆疑问堵在面前：“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为什么那样曲折？小说家的心理障碍为什么那样深刻？倘说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自己，他们所处的时代又该负什么责任？单单一个 20 世纪便能够负

这个责吗？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湮埋在历史之中？最近几年来，我一直想解开这些疑问，却总抓不住实在的答案。虽然有时候也是存心，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太少，又缺乏那一份持续追问的恒心。

但我总得追问下去。为了维持平和的心境而回避真相，似乎还情有可原；害怕长途漫漫而中道放弃对真相的追究，那却不可原谅了。向世界追问它的真面目，这本是生存的最后一项价值，我又怎么敢轻易地放弃？在1989年的秋冬时节，我终于得到一个重读历史的机会，拿书本和人生两相参照，自认也读出了一点个人的心得。它们当然是粗浅和零碎的，不过是阅读中的一感一叹；但我确实又抱有希望，随着这些感叹的逐渐增多，它们会不会聚成一个新的追问的思路，至少也标出一个新的探寻的问号呢？因此，我愿意将它们抄在下面，表示我还没有放弃努力。

二 在邪恶人心的包围中

在春秋晚期，“士”的阶层刚刚诞生，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邪恶的时代，孔子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又何止是他呢？比他早生几十年的老子，晚生几十年的墨子，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斥责，都决不比他更温和。到了战国时期，文人对时代的诅咒还愈加激烈。你看孟子对公都子的那一长篇讲话，从“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①，简直是一概骂倒。再看荀子针对“天下不治”而写的那一首“僇

① 《孟子·滕文公下》

诗”：“天地易伦，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仁人绌约，敖暴擅强，……螭龙为蜺蜺，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①，你会不会立刻联想到《离骚》？荀子对那个颠倒世界的忿懣，似乎比屈原还要强烈。

孔子们的感觉是准确的，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正充满了数不清的灾难。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诸侯间的连年混战，光是这两样，就足以把那个时代搅得一团糟了。不过，对邪恶现象的敏感，这本是文人的特点，只要他还没有麻木到丧失知觉，奴性还来不及吞噬他整个的灵魂，他就总能够感觉出四周的黑暗，不会把遍地枯叶错看成满目春光的。无论是麻木还是奴性，先秦诸子都远不及后人那样严重，他们会大骂自己的时代，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真正体现出先秦文人的精神特点的，并不是他们对邪恶时代的反感，而是他们对这个邪恶的理解。

我有个强烈的印象，似乎先秦诸子都是把时代的邪恶归结为人心的堕落。老子忿忿地说：“大道其夷，而民好径”^②，就是把世事的崩坏归罪于老百姓不

① 《荀子·赋》

② 《老子·五十三章》

肯走正道。孔子则一叠声地叹道：“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①，也是从人心当中去寻找社会冲突的原因。墨子说得更明白，天下的一切坏事，都是来自一种极端自私，不肯“兼爱”的坏心思：“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憚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憚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只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憚举其身，以贼人之身。……”^②，他把这种坏心思称作“别”，说它“果生天下之大害与”^③！为什么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那样为非作歹？因为他们贪得无厌，心肠又太狠：“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④；统治者在上面巧取豪夺，老百姓自然在下面跟着学样：“上重义则[民]义克利，上重利则[民]利克义”，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⑤，这就又和墨子一样，把世道的治乱归结为人心的好坏了。到战国时代，这种荀子式的思路还更加普遍，韩非就是依它来嘲笑孔子的“仁”：“仲尼，

① 《论语·泰伯》

② 《墨子·兼爱中》

③ 《墨子·兼爱下》

④ 《孟子·梁惠王上》

⑤ 《荀子·大略》

天下圣人也，……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义者寡，能义者难也。”^①以天下之大，只有几十人跟你走，你这“仁”不是一句空话吗？倘若孔子再世，我也真不知道他怎样来回答韩非的这番奚落。庄子更是仰天长叹：“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旦暮之情，人者厚貌深情……”^②，庄学是讲究超脱的，却还是忍不住感慨人心的叵测，其他学派的文人会如何重视人心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心似乎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孔子们不但到它当中去挖掘乱世的根源，更把它竖成为一杆衡量历史变化的标尺。孔子描述美妙的“大同”世界的时候，就是把人心淳厚当作最主要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③他悲哀世道的今不如昔的时候，也是把鞭子对准了“不古”的人心：“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庄子·列御寇》

③ 《礼记·礼运》

也直，今之愚也许而已矣。”^①他对上古淳厚人心的热烈赞颂，是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齐声高唱的，譬如在《老子·八十章》中，《庄子》的《缮性》篇中，连赞颂的语气都和他很接近。他对人心不古的生动描述，更是被荀子和韩非一再重复，什么“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人心简直成为“历史”的同义语了。

每个人都愿意吃得好，穿得好，过快乐富足的日子，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是，这人的本性又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恰如一片光秃秃的田野，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会长出怎样的植物，并不取决于它自己，而要看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看造物主向它洒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又为它配备了什么样的气候：从经济、宗教、政治，一直到道德、军事、艺术。就拿春秋战国时代来说吧，所以会弄得礼崩乐坏，天下无道，那种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就显然是主要的罪魁。人心并不能主宰世界，在许多时候，它其实倒是个可怜的被主宰者。与孔子们大致同时的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就看得比较清楚，虽然也感慨人的道德堕落，他们的视线，

① 《论语·阳货》

② 《韩非子·五蠹》

却总是落在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样实在的东西上面。可先秦文人就不同了，从孔子开始，大多数人似乎都盯住那抽象的人心，把它看作是时代的主宰者，无论什么坏事情，都要拉它来负责任：这种特别的眼光，究竟是怎么来的？倘说孔子是没有办法，他认定西周的社会制度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现实偏偏又非常糟糕，他就只有归咎于人心的恶化，那其他许多并不像他一样迷信传统制度的文人，为什么也都把人心看得那样重要呢？在他们对人心的这种过份的重视背后，是否正隐藏着某种有关中国思想史起源的秘密呢？先秦诸子是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开创者，几千年来，人们经常都只是在他们划定的大范围里精耕细作，并没有谁真能够远远地逾越出去。因此，我就格外想知道，当这些精神垦荒者眺望茫茫荒野的时候，是谁牵引着他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限制了他们的开垦方向？也许，那个被他们盯住不放，以为时刻包围住他们的险恶的人心，正是这些牵引者中的第一位，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许多独特的内容，也正可以由它得到解释？

三 过于世故的眼光

一个人老是盯住一样东西看，时间长了，这样东西就会反过来影响他对其他事物的观察。先秦文人格外注意人心的险恶，看得多了，再遇见别的现象，也就会不自觉地首先从这一面去理解。譬如有这样三个人，一是孔子的弟子曾参，他笃行孝道，曾经表白说：“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道养亲也。亲没以后，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然犹北向而泣者，非为贱也，悲不见吾亲也”^①；二是卫国的大臣史鰌，他多次谏劝卫灵公，那昏君却不听，他便

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吩咐儿子，自己死后先不要埋，就停在家里，向卫灵公作最后的“尸谏”；三是齐国的隐士田仲，非但自己不做官，还不肯接受做官的哥哥的接济，硬是要跑到荒僻的地方去种菜。这三个人，在战国时代都是被大家广泛称颂，誉为圣人的。可是，庄子却别具慧眼，看出他们是沽名钓誉：“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之。”^①荀子则说得更尖刻：“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圣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阨世者也，……田仲、史鰌不如盗也。”^②连圣人都要怀疑，对那些模仿圣人的人，荀子就更不相信了：“今之所谓处士者，……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③“以不俗为俗”，这话说得太犀利了，在这样世故的眼光的重压下，恐怕任何人都会不自在吧。

这种从人心的阴暗面去理解世事的习惯，到韩非那里是发展得更厉害了。先秦的许多典籍都提到一位著名的隐士务光，说是商汤要将天下让给他坐，他坚辞不受，为了表明心迹，干脆背着大石头跳水而死：你看，商汤王是多么无私，务光又是多么清高。可

① 《庄子·骈拇》

② 《荀子·不苟》

③ 《荀子·非十二子》

韩非却不这样看：“汤以代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乃自投于河。”^①原来商汤是这样狡诈，务光是这样懦弱，他所以要自沉，是因为认定已经死路一条！应该佩服韩非的世故，他对务光投水的解释显然更合乎情理。但我又替他感到悲哀，他总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理解人事，自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说到底，世故是一种病态，它起因于对人的不信任。一个人越是世故，他的精神负担就越沉重，心情也就越阴暗。我不禁想起《说林》中的另一个故事：“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门。门者刖跪请曰：‘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夷射叱曰：‘去！刑余之人何事乃敢乞饮长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门罅下，类溺者之状。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而杀之。”这是多么可怕的故事！可韩非的著作，尤其是《说林》篇中，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许多这样的故事，仿佛作

① 《韩非子·说林上》

者是在存心搜集它们。有人说这《说林》是韩非作为写作素材汇编起来的，倘若真是如此，那这些可怕的故事会对他的理论思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韩非的时代，那么多文人成为功利主义的信徒，怕也与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分不开吧？从春秋到战国，世道越来越乱，士的处境也越来越糟；而你看庄子、荀子和韩非子，他们对邪恶人心的体味就明显要比春秋时代的前辈更为深刻，那种世故的眼光也显然更为犀利和执拗，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